

唐代福建佛教的几点观察

——刘轲《福州东山圣泉法华院记》佚文释证

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陈文庆

【摘要】唐代刘轲《福州法华院记》全本今已不可得见，从《释氏通鉴》辑佚的文本保存了碑记的基本内容，通过释证碑文内容，可作如下推论：一、晋隋之寺院局限于闽江流域，特别是入闽交通要线上，唐代福建佛教有了初步发展，这与区域普遍开发有关；二、在唐初天台中衰的背景下，福州法华院成为东南地区弘传天台法门的重要道场，刘轲碑记为迄今发现的天台宗传闽最早文献；三、早期闽籍僧人大都驻锡外地，不归闽中，然从唐代中期开始大量僧人回闽弘法，而闽中三大师是第一批，这促使了福建佛教重镇地位的形成。

【关键词】刘轲；《法华院记》；福建佛教；天台宗

佛教在吴晋之际，随着江（西）浙（江）移民入闽而开始在福建传播。但在此后很长时间，福建佛教的发展并不显著，远逊于浙江和江西，也不及广东。迨至唐代，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其时全省各地出现了大兴佛寺的浪潮，本籍高僧不断涌现，且成为开宗立派的祖师¹，福建成为僧徒游方参学的中心，唐末五代时期，福建真正取得了全国佛教重镇的地位。以往关于这一转变的论述很少涉及，其中很重要一部分原因在于材料的缺略，笔者在查检福建佛教碑文资料时，无意中在南宋本觉所著《释氏通鉴》发现了久已失传的刘轲《福州东山圣泉法华院记》一文。虽是残本，然有关福建佛教的内容基本保存，该碑记忠实纪录了唐代福建佛教转折时期的几个史实。本文从史料辑佚入手，考订刘轲碑记文本，并在此基础上征引僧传、正史、碑录及方志资料疏证碑文内容，并对唐代福建佛教的几个问题作适当推论。

¹ 禅门五派之开宗祖师多为闽僧，如怀海下出汾仰、临济，义存下出云门、法眼，而本寂开曹洞一宗。

《释氏通鉴》卷十“庚戌（太和四）”年系有：

五月，侍御刘轲作《福州东山圣泉法华院记》，略云：“天下精刹往往称闽州胜绝。有东山法华院，为东南（法）窟之一。景龙初有神僧怀道，始卜于爱同之西，卓一泉腾涌喷出，两道分注，一注濯所，一流为池，（乃记讖曰：缩去离乱，涌来太平，邻寺有泉，此泉不灵）。继有怀一居之。一之后智常（恒）居之。常有天童密侍，舍利潜降，山神听经。问（闽）中佛法，实自三大师始焉。是院不宿女子，不入荤血，真绝特也（《长乐集》）。”¹

该碑记由南宋括山本觉从《长乐集》中节略而成，有几点需要说明：其一，依据避讳学的知识，智常实为智恒，“恒”为宋真宗赵恒之讳，属避讳改前人名例²；其二，其他文字还存在多处错讹和脱漏，元代熙仲所编《历朝释氏资鉴》卷八同样收录有刘轲碑文，内容更为完整³，两相对勘后可知：1、“东南窟”应为“东南法窟”，中间缺一“法”字；2、“一流为池”后脱漏了“乃记讖曰：缩去离乱，涌来太平，邻寺有泉，此泉不灵”；3、“问中佛法”当作“闽中佛法”，“问”乃“闽”之讹。《历朝释氏资鉴》仿《释氏通鉴》体例编辑而成，大量引用了《通鉴》的内容，且熙仲所录的刘轲碑记无有出处，大概也采自本觉本。《释氏通鉴》碑记的错讹是在版本流传中脱落所致，考虑到史料的版本源流，本文采用了本觉祖本。本觉辑录的底本——《长乐集》今已不可得见。

《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总集类”著录有“长乐集十四卷，福建提刑吴兴俞向集，宣和三年序”⁴。俞向于宣和元年（1119年）和五年两任福建提刑司⁵。另《輿地纪胜》卷一百二十八引用有谢泌“长乐集总序”中赞美福州寺院盛况

¹ 《释氏通鉴》卷一〇，《卍新纂续藏经》第76册，第114页。

² 陈垣：《史讳举例》，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初版，第125页。

³ 《历朝释氏资鉴》卷八，《卍新纂续藏经》第76册，第207页。

⁴ 《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初版，第455页。

⁵ 淳熙《三山志》卷二五《秩官类六》，影印明万历癸丑刊本，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年初版，第219页。

的诗句¹。据《通鉴》书首的“采摭经传录”，《长乐集》列入了“儒书”类²，该集在《通鉴》中被征引了五次³，时间下限至五代闽国时期。综合以上判断，《长乐集》为俞向在闽时采摭有关福建诗文编辑而成，其中含有大量佛教类作品。也许是宋时福建为全国佛教重地，本觉编辑《释氏通鉴》时都要尽力搜括福建佛教文献。《释氏通鉴》为编年体佛教通史，上起至周昭王二十六年（前1027年）下迄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时间达一千九百余年。该书引证均注明出处，但多为节略。“庚戌”年所录碑记即为刘轲《福州东山圣泉法华院记》节略部分。南宋陈思所编《宝刻丛编》引《诸道石刻录》著录云“唐刘轲撰，大和四年立碑，三面皆刻字”⁴。福建历代金石录，如冯登府《闽中金石志》、陈荣仁《闽中金石略》及陈衍《福建金石志》皆转载陈思所录⁵。刘轲碑记后世又称《圣泉院记》，淳熙《三山志》卷三十三“东山圣泉院”亦有著录⁶，同书卷二十一“秩官类二”又有多处征引⁷。但碑记全文今已不可得见，《全唐文》卷七四二刘轲条无收⁸，民国《丛书集成初编》收录的《刘希仁文集》也未见载录⁹。实赖《释氏通鉴》的征引，这篇碑文得以保存，诚所谓古书有名亡而实不亡者（郑樵语）。

作记者刘轲，新、旧唐书无传，其始末未详。《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著录“刘轲《帝王历数歌》一卷”小注云：“字希仁，元和末进士。洛州

¹ 谢泌《长乐集总序》：“湖田种稻重收谷，山路逢人半是僧。城里三山千簇寺，夜间七塔万枝灯。”《舆地纪胜》卷一二八《福建路·福州·福州诗》，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676—3677页。

² 《释氏通鉴》卷首，第2页。

³ 《释氏通鉴》卷六、卷一〇、卷一一、卷一二。

⁴ 《宝刻丛编》卷一九《福建路》，《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2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二版，第18361页。

⁵ 详见《石刻史料新编》各收录本。其他著录的还有清鲁曾煜《福州碑碣志》，收录《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第17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初版，第12页；乾隆《福州府志》卷七十三“碑碣”，收录《中国方志丛书》（第七十二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初版，第1354页。

⁶ 淳熙《三山志》卷三三《寺观类一·僧寺》，第374页。

⁷ 淳熙《三山志》卷二一《秩官类二》，第179页。

⁸ 《全唐文》卷七四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初版，第7670—7685页

⁹ 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第2358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初版。此据《岭南遗书》收录的清代屈大均《刘御史文集》辑佚本排印整理而成。

刺史。”¹徐松《登科记考》记其元和十三年（818年）进士及第²。其书信和唐人笔记小说保存了更多的传记资料，刘轺《上座主书》自谓：“轺本沛上耕人，代业儒为农人家。天宝末流离于边，徙贯南鄙。……贞元中，轺仅能执经从师。元和初，方结庐于庐山之阳，日有芟蕘畚筑之役。虽震风凌雨，亦不废力火耨。或农圃余隙，积书窗下，日与古人磨砉前心。岁月悠久，浸成书癖。故有《三传指要》十五卷，《十三代名臣议》十卷，《翼孟子》三卷。”³王定保《唐摭言》云：“轺慕孟轲为文，故以名焉。少为僧，止于豫章高安之果园。后复求黄老之术，隐于庐山。既而进士登第，文章与韩、柳齐名。”⁴刘轺祖籍沛上（今江苏沛县），安史之乱先祖流寓岭南（韶州曲江），刘轺即在落籍韶州后所生，时间可能就是后世方志所说的大历中（742—743年）⁵。轺少曾为僧，后隐居庐山多年，元和十三年进士及第，官至洛州刺史⁶，善属文、多著述，“文章与韩、柳齐名”。据《三山志》引《圣泉院记》云“大和初，张公自谏议大夫拜”⁷。张公即张仲方，太和初，辟为福建观察使。又刘轺所作《唐故朝议郎行陕州硤石县令上柱国侯公墓志铭并叙》曰：“大和元年（827年），为福建观察使张公辟，授监察御史里行，充观察推官……其孤以轺尝陪公闽州同僚，情契颇至，故走僮来京师，俾余论撰。”⁸另据北宋陈舜俞《庐山记》卷五《唐栖霞寺故大德毗律师碑（并序）》著录刘轺官衔为“福建观察使朝议郎监察御史里行上柱国”，立碑时间恰好为太和四年⁹。太和初年（827年），刘轺与侯续同为张仲方所辟，任监察御史里行，三人可能私交甚厚。刘

¹ 《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5 年初版，第 1461 页。

² 徐松：《登科记考》卷一八，北京：中华书局 1984 年初版，第 674 页。

³ 《全唐文》卷七四二，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初版，第 7673 页。

⁴ 《唐摭言》卷一一《反初及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初版，第 120 页。

⁵ 嘉靖《广东通志》卷五五《列传十二》，广东省方志办誉印本，1997 年，第 1409 页。

⁶ 洛州刺史为刘轺最高职称，并非进士及第后即拜授，古人传记一般取最高衔。汤擎民先生依据《唐诗纪事》认为洛州应为洺州，按此例仅见于该书，恐为笔画脱漏所致，详见氏著《刘轺生平及著述考略》，《学术研究》1988 年第 4 期，第 70 页。

⁷ 淳熙《三山志》卷二一《秩官类二·郡守》，第 179 页；“大和”又作“太和”，唐文宗年号（827—835）。

⁸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初版，第 2166—2167 页。

⁹ 《庐山记》卷五，《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1 册，第 1048—1049 页。按此条信息由李小荣老师提供，谨志！

轲在闽时间恐怕不会太长，开成二年（837年）作《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时刘轲已居洛师（即洛阳）行修里¹；另据《三山志》卷二十一“秩官类二”记载，太和四年（830年）张仲方观察使一职即由桂仲武接任²，因此刘轲在闽时间大概只有四年。可以这样设想，太和四年（830年），刘轲离闽之时与张、侯等人同游福州东山法华院，因此才有了《法华院记》的创作，过后即离开福建回到了洛阳。刘轲与佛教的关系向为学界所忽视，刘轲一生创作了大量有关佛教的作品，这些作品对研究刘轲生平和思想具有重要价值，刘轲《法华院记》即是其一，但这些作品都未曾好好整理，因与本文主题无关，这里就不展开了。

二

除《法华院记》外，刘轲释门撰述可以考知的还有《庐山黄石岩记》、《智满律师塔铭》、《栖霞寺故大德毗律师碑》、《庐山东林寺故临坛大德塔铭并序》、《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并序》³、《石头希迁碑记》、《丹霞天然碑记》、《南泉普愿碑记》⁴、《唐庐山东林寺故宝称大律师塔碑》⁵等，刘轲早年混迹佛门、此后更是以文会友、与释门相酬唱，于当时佛教现实有相当了解，更为重要的一点，刘轲虽以文学名家，但致力经史之学，曾言：“伏念自知书来，耻不为章句小说桎梏生病之学。敢希趾遐踪，切慕左丘明、杨子长、司马子长、班孟坚之为书。故比居庐山，亦常有述作。”⁶其文学作品具有实录性质，如《希迁碑记》中记载的“自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头，往来憧憧，不见二大士为无知矣。”⁷不仅

¹ 《全唐文》卷七四二，第7681页。

² 淳熙《三山志》卷二一《秩官类二》，第179页。

³ 《全唐文》卷七四二，第7678—7685页。

⁴ 《宋高僧传》卷九、卷一一。

⁵ 《庐山记》卷五，第1049页。

⁶ 《全唐文》卷七四二《上崔相公书》，第7670页；道光《广东通志》曾据刘轲文章自述和各家目录，著录作品共十二种，然大多佚失不存，从篇名推测的历史撰述有《汉书右史十卷》、《隋鉴一卷》、《十三代名臣议十卷》、《唐年历一卷》、《帝王镜略一卷》和《牛羊日历一卷》等，道光《广东通志》卷二八八《列传二十一·韶州一》，《续修四库全书》据1934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清道光刻本，第67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初版，第75—76页。

⁷ 《宋高僧传》卷九《唐南岳石头山希迁传》，《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763页。

是当时南宗禅的真实写照，更成为后世谚语“走江湖”的重要文学来源。刘轲的文章如实记录了唐代佛教状况，可补佛教史传之不足。《法华院记》虽为节略，但其中所含信息对福建佛教的历史论述足有发覆之功。兹就碑文所记逐一作疏证和推论。

闽州即今福州，唐景云元年至开元十三年（710—725）福州曾一度称为闽州¹。“天下精刹闽州胜绝”刘轲认为福州寺院冠盖天下，这其中当然有文人的溢美之词。由于福建唐时寺院建筑现已不存，也未见有寺院之考古报告发表。刘轲对福州寺院的描述无法证其虚实，然从寺院之数量上仍可见其大概。《三山志》卷三十三“寺观”略云：

自晋太康始寺绍因于州北，既而终晋才益二寺。越二百载，齐之寺一，梁之寺十七，陈之寺十三，隋之寺三。唐自高祖至于文宗二百二十二年，寺止三十九；至宣宗乃四十一（双行夹注：时间人林谔作记存寺七十八，废寺三十六），懿宗一百二，僖宗五十六，昭宗十八。殫穷土木，宪写宫省，极天下之侈矣！²

这是传世文献中，有关福州佛教的最早记载。西晋太康年间福州城北已建有名为绍因的寺院，此地以后成为福州寺院集中区，这也是刘轲碑记中法华院之所在。但在此后的三百年间福州佛寺并未有大的发展。直到唐文宗太和年间，也就是刘轲创作《法华院记》的时代，寺院已达三十九所。陈傅良用了“止”字，即不超过之义，必须说明，这一记载只是相较唐后期福州寺院繁盛为少，如果从横向来比较，以当时全国统计：唐武宗会昌毁佛（854年）检括毁坏寺院四千六百余所³，李吉甫元和二年（807年）上《元和国计簿》⁴，合计天下州府二百九十五，统计每一州寺院大概为十六所。两相比较，福州寺院远多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刘轲

¹ 淳熙《三山志》卷二一《秩官》，第174—175页；按刘轲时代已无闽州之名，盖因古时文人作文喜用故称，历史上福州称为闽州的还有南朝陈永定年间（557—559年），武帝授陈宝应为闽州刺史，载《陈书》卷三五《陈宝应传》，又《舆地广记》卷三四。

² 淳熙《三山志》卷三三《寺观类一·僧寺》，第363页。

³ 《旧唐书》卷一八《武宗本纪》会昌五年八月“制”，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06页；按由于当时政策每州只留一寺，余皆取缔，因此四千六百余所大致等于全国寺院总数。

⁴ 《元和国计簿》原书已佚，《旧唐书》卷一四《宪宗本纪》有著录，第424页。

的时代福州佛教已有了初步发展,不同于晋隋时期佛法之不振。刘轲游历福州时,大概看到了此地佛寺之规制不亚于其他地区而发此感慨。“殫穷土木,宪写宫省,极天下之侈矣!”这句话在唐文宗时期的福州寺院同样适用。这是唐时福州的情况,我们再把考察范围扩大到全省其他地区。《八闽通志》是福建现存最早的地方总志,博采各府县志资料编辑而成,四库馆臣评价其为淳熙《三山志》以后唯独的善本¹,不同于明清方志的粗制滥造。其中寺观类“不考其已废者而并载之”²,这种不管存废、悉数记录的方式,使各朝代之寺院信息保存较好。我们即以该志寺观类部分为主要资料,以朝代为经、府县为纬,统计福建各朝代始置寺院数额。

表一: 晋—五代寺院统计表

府县	朝代	西晋	东晋	宋	齐	梁	陈	隋	初唐	中唐	晚唐	五代
		福州	闽县	0	0	0	0	8	4	1	6	4
	候官	2	0	1	1	6	2	1	1	4	31	29
	怀安	1	0	0	0	1	2	0	0	6	19	28
	长乐	0	0	0	0	4	2	0	1	2	31	16
	连江	0	0	0	0	2	2	4	0	1	22	13
	福清	0	0	0	0	3	8	0	1	2	28	18
	古田	0	0	0	0	0	0	0	6	0	13	24
	永福	0	0	0	0	0	0	0	1	0	27	19
	闽清	0	0	0	0	0	0	0	0	1	8	15
	罗源	0	0	0	0	0	0	0	0	0	18	21
	合计	3	0	1	1	24	20	6	16	20	222	202
建宁	建安	0	0	0	0	0	0	0	0	0	4	18
	瓯宁	1	0	0	0	0	0	0	4	1	12	39
	浦城	0	0	0	0	1	0	1	3	1	2	0
	建阳	1	1	0	0	0	0	0	4	0	40	64
	松溪	0	0	0	1	0	0	0	1	0	8	13
	崇安	0	0	0	0	0	0	0	3	0	23	24
	政和	0	0	0	0	0	0	0	2	0	20	15
	寿宁	0	0	0	0	0	0	0	0	0	0	1

¹ 《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八《史部·地理类一》,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07页。

² 《八闽通志》卷七五《寺观》,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9页。

	合计	2	1	0	1	1	0	1	17	2	109	174
泉州	晋江	0	0	0	0	0	0	0	4	1	5	10
	南安	0	0	0	0	0	0	0	2	1	3	10
	同安	0	0	0	0	0	0	0	0	0	0	1
	德化	0	0	0	0	0	0	0	0	0	0	2
	永春	0	0	0	0	0	0	1	0	2	8	3
	安溪	0	0	0	0	0	0	0	0	0	0	0
	惠安	0	0	0	0	0	0	0	1	0	5	5
	合计	0	0	0	0	0	0	1	7	4	21	31
漳州	龙溪	0	0	0	0	0	0	0	1	0	0	5
	漳浦	0	0	0	0	0	0	0	0	0	1	0
	龙岩	0	0	0	0	0	0	0	0	0	0	0
	长泰	0	0	0	0	0	0	0	0	0	0	0
	南靖	0	0	0	0	0	0	0	0	0	0	0
	漳平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合计	0	0	0	0	0	0	0	1	0	1	5
汀州	长汀	0	0	0	0	0	0	0	1	0	0	8
	宁化	0	0	0	0	0	0	0	1	0	1	3
	上杭	0	0	0	0	0	0	0	0	0	2	1
	武平	0	0	0	0	0	0	0	0	0	0	1
	清流	0	0	0	0	0	0	0	1	0	0	0
	连城	0	0	0	0	0	0	0	0	0	0	5
	归化	0	0	0	0	0	0	0	0	0	0	0
	永定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合计	0	0	0	0	0	0	0	3	0	3	18	
延平	南平	0	0	0	0	1	0	0	2	2	5	4
	将乐	0	0	0	0	0	0	0	3	0	2	2
	尤溪	0	0	0	0	0	0	0	0	0	5	7
	沙县	0	0	0	0	0	0	0	0	0	4	3
	顺昌	0	0	0	0	0	0	0	0	0	1	2
	永安	0	0	0	0	0	0	0	0	1	8	7
	合计	0	0	0	0	1	0	0	5	3	25	25
邵武	邵武	0	0	0	0	0	0	0	13	2	12	13
	泰宁	0	0	0	0	0	0	0	5	1	6	14
	建宁	0	0	0	0	0	0	0	1	0	5	37
	光泽	0	1	0	0	0	0	0	1	0	11	11
	合计	0	1	0	0	0	0	0	20	3	34	75

兴化	莆田	0	0	0	0	0	3	0	2	2	13	10
	仙游	0	0	0	0	0	0	0	3	0	2	2
	合计	0	0	0	0	0	3	0	5	2	15	12
福宁	本州	0	0	0	1	0	0	2	0	0	6	12
	宁德	0	0	0	0	1	0	0	1	3	23	11
	福安	0	0	0	0	0	0	0	0	0	12	4
	合计	0	0	0	1	1	0	2	1	3	41	27

注：1、寺院无年代者不计入统计。

2、表中所列府县依《通志》的顺序。

3、志中所列某某堂一般佛道混合，无法区分；为求数据完整，本表一律归入佛教统计。

4、唐代时间跨度大，且各时期又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故以安史之乱和会昌法难为界分为初、中、晚各时期。

按本表所统计的寺院具体数额可能与史实有出入，但大体可以反映出福建佛教发展的历史趋势。根据表格所示，福州各时期寺院总额与《三山志》的记载大体吻合，说明上文所得结论无差。《通志》认为福建最早的寺院也就是西晋时期共有五所，即太康元年的药山寺，太康三年的灵塔寺和乾元寺，俱属福州，还有太康中的开元寺及灵耀寺，均位于建宁。按药山寺之始置年月，《通志》系于西晋太康元年（280年），而淳熙《三山志》为南朝陈宣帝太建元年（569年），今以《三山志》的记载为准¹。另据今人研究，西晋寺院还有南安县延福寺，建于太康九年²。综上可知，福建于史有征的最早寺院建于西晋太康三年，即乾元寺和灵塔寺两所。是年西晋王朝在原有建安郡上析置了晋安郡，管理福建东部沿海地区，因无诸旧城狭小，另寻新址建立郡治，乾元寺即在旧城基础上修建³。可以推断，乾元寺的建造有很深的官方背景。更近一步说，福建早期寺院的兴建在于中央王朝的经略和地方政府的推动。再如据嘉靖《建阳县志》记载灵耀寺为时任建安太守孟景祥所建⁴。需要指出，寺院在佛教信仰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会出现，因

¹ 王荣国《福建佛教史》采用了前者的说法，《通志》属后出，在没有新材料出现的情况下，《三山志》的记载不可推翻，详见王荣国：《福建佛教史》，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第 5 页。

² 朱维幹：《福建史稿》，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第 64 页；王荣国：《福建佛教史》，第 9 页。

³ 淳熙《三山志》卷三三《寺观类一》，第 364 页。

⁴ 转引自王荣国：《福建佛教史》，第 10 页。

此加上传播时间，佛教在孙吴时期即已在福建开始流布，而入闽线路又是如何呢？学者研究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移民入闽路线主要有四条¹，而据表一所示，两晋南北朝时期寺院恰好分布在这些入闽交通要道上。如光泽县即位于赣闽交通线上，县以西就是著名的杉关，联通江西的东兴县，为由赣入闽最为平坦的一条线路²，沿富屯溪而下即可达邵武；往东过麻沙镇可达建阳，再沿崇溪南下就到了瓯宁；浦城、松溪地处闽浙边界，再如福州、福宁两州都是自海入闽的桥头堡。这些地区都成为移民的早期聚居区，福建早期寺院正是在这些地方建立。易言之，早期寺院即以这些侨民为信仰基础建立起来。早期福建移民一般为就近迁入者，即从临近的江西和浙江迁移而来，福建并非是永嘉之乱中民族大迁徙的接受地³，正是这些移民把佛教从江浙带到了闽中。福建佛教现在往往被认为是江南佛教的一部分⁴，其中一部分原因正是由于这种历史渊源关系。

吴晋之际佛教虽已传入闽中，然在此后的三百余年，其发展相当缓慢而且极不平衡。如表一所示，晋—陈时代，寺院集中分布于福州和建宁两地，即闽江流域，而闽西、闽南两地却一片空白。统计数据可能不完整，但结果出入不会太大。我们认为，在很长一段时期闽江流域一直是福建寺院的集中区。即使在寺院最多的福州，其发展速度也不会太快，上引《三山志》记载“越二百载，齐之寺一，梁之寺十七，陈之寺十三，隋之寺三”，寺院数额始终不过二十。然而到了唐代，寺院如同雨后春笋，在八闽各地大量涌现，以晚唐时期统计，福建所辖五州（即表一的九府）都已有寺院出现。寺院数量也相当惊人，福州一地就有二百余所。但同时又必须看到，这种发展并未打破此前格局，闽江流域仍是福建寺院的集中区。寺院的出现有其特定的社会基础，早期佛教在福建的传播与区域开发始终相

¹ 胡沧泽：《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汉人入闽及其对福建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2期，第29—30页。

²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八六《江西四》，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977页。

³ 谭其骧：《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收录《长水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初版，第199—223页；又葛剑雄：《早期福建移民史实辨正》，《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第165—171页。

⁴ 严耀中：《中国东南佛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初版，第3页。

伴随。一般来说，某一地区的开发程度与该地的人口数量和行政建制有密切关系¹。福建历史上明确的人口记录始于西晋时期，《晋书·地理志》记载太康初年晋安和建安两郡户口数俱为 4300 户，在同属扬州的各郡里，明显偏低²。其时福建刚纳入西晋版图，人口主要以闽越族为主，移民入闽还比较少。到了隋代户口即达 12420 户³，而唐建中时期（780—783 年）更骤增至 93535 户⁴。晋唐之间户口增加了 84935 户，人口的自然增长固然是一方面，但主要还是吸纳了大量入闽移民所致。佛寺的兴建正是为了满足众多侨民的信仰需求，所以唐代福建寺院大量涌现也就不足为怪了。从行政建制来看，南朝闽中有十七县，隋代裁撤为四县，唐代又增列为二十四县。县治的建立是在人口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政府为了有效管理该地和征收赋役而设置的。由于移民的大量涌入，出现了众多不纳赋役的逃户，唐朝专门在这些地区设置了州县，招抚流民，纳入版籍，称之为“开山洞”。如开元二十一年（733 年）开福、抚二州山洞而治汀州，领长汀、沙县、宁化三县⁵，是为闽西建州之始。其他还有古田、尤溪、永泰三县也都是当时开山洞而增设⁶，属福州管辖。另外一种是为管控少数民族裔而设的羁縻州，特别是垂拱二年（686 年）在“獠蛮啸聚”的闽广之交设立漳州，这在漳州早期开发史上有深远影响⁷。唐时闽中增设的大量州县至今都还在沿用，从福建州县设置的先后顺序来看，其开发呈现先沿海后内陆、先平原后山区的特征。以往的蛮荒之地，如闽西、闽南等，唐时都已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开发，这就不难解释为何汀州、漳州及

¹ 有关福建区域开发可参看：[美]毕汉思撰、周振鹤译：《唐代以前福建的开发》，《历史地理》第五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第 238—291 页；吴修安：《福建早期发展之研究——沿海与内陆的地域差异》，台北：稻香出版社 2008 年初版。

² 《晋书》卷一四《地理志上》，转引自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初版，第 45 页。

³ 《隋书·地理志》卷三一《志第二十六·地理下》建安郡条，北京：中华书局 1973 年初版，第 879 页。

⁴ 根据杜佑《通典》卷一八二《州郡十二》福建所属各郡统计，万有文库本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 1984 年初版，第 968-969 页。

⁵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九《江南道五·汀州》，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初版，第 722—723 页。

⁶ 开元二十九年（741 年）置古田、尤溪二县，永泰二年（766 年）置永泰县，《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九《江南道五·福州》，第 717—718 页。

⁷ 有关漳州早期史可参看谢重光师：《陈元光与漳州早期开发史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94 年初版。

古田、尤溪、永泰等县到了唐代才有寺院出现了。州县的普遍设立是福建区域开发成熟的标志，而佛教的发展正是区域普遍开发的结果。

三

“闽中佛法，实自三大师始焉”，刘轲认为福建佛教真正开始于怀道、怀一、智恒三大师。三大师《宋高僧传》皆分科于“感通篇”，颇具神异色彩。“感通篇”所收僧传生平都较为简略，有些甚至只字未提，有关三大师的碑刻资料也佚失不存。根据碑录信息和僧传资料大致可以勾勒其生平行实，宋传卷十九《唐福州爱同寺怀道传附智恒》乃赞宁采录《怀道碑铭》和《智恒碑铭》二碑文缩写而成，师承不可得知，但说“还乡之日，礼佛勤劬”可知其本籍福州，另据《宝刻丛编》引《集古录目》著录《唐东山爱同寺怀道阁梨碑》注云“唐括州刺史李邕撰并书。阁梨姓陈氏，为福州爱同寺僧。碑以开元二十五年七月立。”¹怀道可能即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入灭²，刘轲碑记说“景龙初（707年）有神僧怀道，始卜于爱同之西”，又《三山志》卷三十三说“神龙中（705—706年），律师怀道、怀一相继居之（爱同寺）”³，怀道约生活于高、玄宗时期，中宗神龙年间回到故乡，驻锡于爱同寺，景龙初开山法华院。怀一传附于宋传卷十九《唐简州慈云寺待驾传》后，记述怀一景龙中于爱同寺以东建造精舍，即后来的楞伽寺⁴。按僧传体例，同传者并不一定有直接师承关系，怀一很大可能受业于扬州龙兴寺法慎律师，宋传十四法慎条说“其上首曰会稽昙一、闽僧怀一”⁵，如果属实怀一亦本籍

¹ 《宝刻丛编》卷一九《福建路》，《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24册，第18360页。按郑樵《通志·金石略》作“大律故怀道阁梨碑”，《诸道石刻录》同。

² 按宋传怀道条云：“洎至德二年（757），令弟子僧常持法华经，不舍昼夜”，其时怀道已圆寂，怎能令弟子持法华经呢！纪年大概有误，载《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834页。

³ 淳熙《三山志》卷三三《寺观类一》，第373页。

⁴ 永泰二年（766），代宗题额楞伽寺，《宋高僧传》卷一九《唐简州慈云寺待驾传附怀一》，《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834页。

⁵ 按《文苑英华》卷八六二收录有李华《扬州龙兴寺经律院和尚碑》（《全唐文》、四库本《李遐叔文集》亦有著录），与宋传法慎条对读，文苑本无怀一，而只有“福州开元寺宣一”，《文苑英华》较宋传为晚，且错漏较多，文苑本可能有讹误，待考，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初版，第4548页。

福建。怀一于永泰二年¹（766年）归寂，与怀道可能为同辈但较长寿，活到了代宗时期。据刘轲说，怀道圆寂后怀一继主法席，时间约为（737—766年）。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年）越州刺史皇甫政为碑纪德²，宋传怀一条即采录于此。智恒为怀一上首弟子³，道行与其师相称⁴，怀一入灭后继续住持法华院，贞元八年圆寂⁵。

该寺以法华命名，有天台宗的嫌疑，刘轲所云“东南法窟”似即指佛教义学而言。据碑录所载，三大师俱为律师，而宋传却分科于感通篇，看来律学修为并不显著。僧传所载神异现象多与法华信仰有关⁶，如怀道“令弟子僧常持法华经，不舍昼夜”而冥感天降袈裟。据僧传说，怀一等人“罔不成乐说辩才，入法华三昧”⁷，怀一经常持诵法华经并与大众讲习，证得法华三昧，其师法慎虽为律师，然“谓天台止观包一切经义，东山法门是一切佛乘。色空两亡、定慧双照，不可得而称也”，是一位禅律俱运、宗教兼通的高僧。“法华三昧”语出《法华经》卷七“妙音菩萨品”，为天台忏法之一，其三祖智顗撰有《法华三昧忏仪》一卷，其后湛然撰《法华三昧行事运想补助仪》一卷⁸。隋唐两代是中国佛教的宗派化时期，修行法门也具有了宗派特色。天台宗教观并重，于禅法、义学同样重视。怀一受其师影响，回闽后大阐宗风，弘传天台止观法门，门下弟子如智恒、超悟、行弼等，也都“化于闽俗，无不重焉”⁹。以三大师为首的法华院僧团，成为东南地区重要义学道场，被刘轲誉为“东南法窟”。可惜由于材料缺略，三大师的佛学思想我们已很难得知了。从地理上说，怀一其师法慎驻锡扬州龙兴寺，其同门

¹ 即代宗大历元年，是年有二元。

² 《宝刻丛编》卷一九《福州东山怀一律师碑》引《复斋碑录》著录“唐皇甫政撰，褚长文正书，邱悌篆额，贞元八年四月十五日立。”《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24册，第18360页。

³ 《宋高僧传》卷一九《唐简州慈云寺待驾传附怀一》，《大正藏》第50册，第834页。

⁴ 《宋高僧传》卷一九《唐福州爱同寺怀道传附智恒》，第834页。

⁵ 智恒圆寂后，礼部侍郎刘太真作《唐爱同寺西院大律师碑》，《诸道石刻录》著录，转引自《宝刻丛编》卷19，《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24册，第18360页。按陈衍《福建金石志》因不知西院大律师即为智恒，而误认刘碑属怀道，陈石遗疏矣！

⁶ 有关法华信仰的研究，可参看释圣严：《中国佛教以〈法华经〉为基础的修行方法》，载《中华佛学学报》1994年第07期，第1—16页。

⁷ 《宋高僧传》卷一四《唐扬州隆兴寺法慎传》，《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796页。

⁸ 两书均收于《大正藏》第46册。

⁹ 《宋高僧传》卷一九《唐福州爱同寺怀道传附智恒》。

义宣弘法于常州兴宁寺¹。扬州、常州俱位于江表，这些都是天台宗的传统化区。福州北接浙江，与天台山相遥望，其宗传演在地缘上有优势。学界以往大多关注天台宗之北传²，而忽视了其南下，从时间上算，天台宗福建一系要早于两京系。在天台宗传播史实问题上，刘轲碑记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线索和资料。福建向为佛教边地，唐代虽有初步发展，但在福州地区出现有全国影响的天台道场似乎不大可能。天台宗是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个宗派，在陈隋时代出现了繁盛局面，但唐初的几代——法华智威、天宫慧威、左溪玄朗，都没有什么建树，只是守成而已，直到荆溪湛然（715—782年）经过努力才中兴天台³。怀道、怀一二师远在湛然之前，在天台宗中衰的大背景下，法华院成为“东南法窟”的可能性是完全有的。

佛教入闽远在吴晋之际，而刘轲却说福建佛教始于闽中三大师，刘说恐怕另有所指。僧人籍贯和驻锡地是考察区域佛教地理的两大要素，我们以历代僧传为主要资料分别制作了唐末之前闽籍及寓闽高僧一览表，通过统计涉闽僧人情况，庶几可以窥探福建佛教发展的整体水平。

表二、唐末以前闽籍高僧表

序号	法名	生卒年	籍贯	驻锡地	资料来源	备注
1	智晞	556—627	未详	天台山国清寺	《续僧传》卷19 《疑年录》页74	祖籍颍川，家于闽越
2	怀道	737卒	福州	福州法华院	《宋僧传》卷19	
3	怀一	766卒	闽人	福州法华院	《宋僧传》卷19 《疑年录》页118	怀道卒后居法华院（《刘轲碑记》）
4	智恒	792卒	未详	福州法华院	《宋僧传》卷19	怀一卒后接任法席
5	守如	未详	未详	福州爱同寺	《宋僧传》卷26	“开元十年于寺营浴室”
6	志贤	未详	建阳	太原甘泉寺	《宋僧传》卷9	“大（天）宝元年（742）于本州佛迹岩承事道一禅师”

¹ 《宋高僧传》卷一四《唐常州兴宁寺义宣传》，《大正藏》第50册，第796页。

² 如严耀中：《中国东南佛教史》第八章《奇峰突出在天台》，第145—158页；徐文明：《唐中期至五代时的天台宗两京支系略考》，载《宗教研究》创刊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³ 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初版，第168页。

7	道通	731—813	泉州南安	唐州紫玉山	《宋僧传》卷10 《疑年录》页134	祖籍庐江，父宦于泉州南安，天宝初师事马祖
8	圆修	735—833	福州	杭州秦望山	《宋僧传》卷11 《疑年录》页136	得心印于百丈怀海
9	神暄	742—817	建阳	婺州金华山	《宋僧传》卷20 《疑年录》页141	得法于志贤
10	怀海	749—814	福州长乐	江西奉新	《宋僧传》卷10	
11	怀晖	756-815	泉州南安	雍京章敬寺	《宋僧传》卷10	
12	明觉	831卒	建阳	天目山千顷院	《宋僧传》卷11	祖籍河内，后徙居为建阳人；师事马祖
13	希运	853卒	福州福清	江西黄檗山	《宋僧传》卷20 景德录九 《疑年录》页151	
14	灵佑	771—853	福州长溪（霞浦）	潭州大沕山	《宋僧传》卷11 《疑年录》页152	
15	隐峰	未详	建州邵武	代州北台山	《宋僧传》卷21	师事普愿（748-834），经历元和淮西之乱（814）。
16	物外	885卒	福州	天台山国清寺	《宋僧传》卷20 《释门正统》卷2 《疑年录》页160	天台宗十二祖
17	大安	793—883	福州	福州怡山	《宋僧传》卷12 景德录九 《疑年录》页157	开悟于石巩慧藏，印可于沕山灵佑
18	楚南	813—888	闽人	杭州千顷山	《宋僧传》卷17 《疑年录》页162	黄檗希运法嗣
19	慧恭	820—903	福州	天台紫凝山	《宋僧传》卷12 《疑年录》页164	德山宣鉴法嗣
20	义存	822—908	泉州南安	福州雪峰山	《宋僧传》卷12 《疑年录》页165	
21	全豁	828—887	泉州	鄂州岩头院	《宋僧传》卷23	

					《疑年录》页 165* 景德录十六	
22	师备	835—908	福州	福州玄沙寺	《宋僧传》卷13 《疑年录》页167	雪峰义存法嗣
23	本寂	840—901	莆田	抚州曹山	《宋僧传》卷13 《疑年录》页168 《景德录》卷17	洞山良价法嗣
24	智宣	未详	泉州	游西域礼佛 八塔	《宋僧传》卷30	西行求法，梁开平元年 (907)回
25	惟劲	未详	福州长 溪 (霞 浦)	南岳般舟道 场	《宋僧传》卷17	雪峰义存法嗣
26	如敏	未详	闽人	韶州灵树院	《宋僧传》卷20	大安法嗣

表三、唐末以前高僧流寓福建表

序号	法名	生卒年	本籍	在闽行实	资料来源	备注
1	僧群	未详	未详	“迁居罗江县之霍山，构立茅室。”	《高僧传》卷12	霍山即霍童山
2	宝唱	未详	吴郡 (苏州)	“遭乱入东，远至闽越”	《续僧传》卷1	天监四年 (505)回建康
3	拘那罗陀 (真谛)	499—569	优禅尼国 (印度摩尔 瓦)	“陈武永定二年七月……又止临川、晋安诸郡”	《续僧传》卷1 《疑年录》页77	驻闽时间达五年(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4	智文	509—599	丹阳	“属梁末祸难，乃避地于闽下，复光岭表……又与真谛同止晋安，故得讲译都会，交映法门”	《续僧传》卷21 《疑年录》页47	《疑年录》误作卷二十二
5	阇那崛多	523—600	犍陀罗 (巴基斯坦 白沙瓦)	“又在瓯闽，道声载路，身心两救为益极多”	《续僧传》卷2	
6	道一	709—788	汉州什邡 (德阳)	天宝初于建阳佛迹岭开法	《宋僧传》卷10 《疑年录》页126	
7	惟宽	755—817	信安 (衢州)	“贞元六年(790)始行化于闽越间”	《宋僧传》卷10 《疑年录》页148	

8	元表	847 卒	高丽 (朝鲜)	“遂负华严经八十卷，寻访霍童礼天冠菩萨，至支提石室而宅焉”	《宋僧传》卷 30 《疑年录》150	天宝中来华
9	玄畅	797—875	宣城	二十岁往福州兜率戒坛受具足戒。	《宋僧传》卷 17 《疑年录》页 158	
10	慧稜	854—932	盐官 (海宁)	驻锡福州长庆院	《宋僧传》卷 13 《疑年录》页 172	义存法嗣
11	道恣	866—937	永嘉 (温州)	“终顿息疑于雪峯，闽中谓之小恣布纳”	《宋僧传》卷 13 《疑年录》页 177	义存法嗣
12	桂琛	867—926	常山 (衢州)	漳州罗汉院	《宋僧传》卷 31 《疑年录》页 177	师备法嗣
13	灵照	870—947	高丽 (朝鲜)	“入乎闽越得心于雪峰，苦志参陪，以节俭勤于众务，号照布纳焉”	《宋僧传》卷 13 《疑年录》页 178	
14	鸿休	880—881 卒	未详	福州黄蘗山建福寺	《宋僧传》卷 23 《疑年录》页 159	
15	文益	885—958	余杭 (杭州)	“曾住漳浦罗汉”	《宋僧传》卷 13 《疑年录》页 184 《景德录》卷 24	
16	彦求	961 卒	缙云 (丽水)	“乃游闽岭，得长庆禅师心诀”	《宋僧传》卷 28	
17	如一	未详	未详	驻锡福州钟山，“开元末为僧典床座”	《宋僧传》卷 19	
18	法炯	未详	未详	闽城，“行头陀法克苦克勤，激劝闽人辞气刚直。”	《宋僧传》卷 20	
19	本净	未详	未详	“响闽岭多禅宗知识，故历参之。”	《宋僧传》卷 21	初入霍童山，后驻锡福州保福寺
20	光嗣	未详	太原	“决意越重湖登闽岭，盛谈文殊世界”	《宋僧传》卷 28	

注：1、两表据大正本《高僧传》、《续高僧传》（简称《续僧传》）及《宋高僧传》（简称《宋僧传》）制定，另参考大正本《景德传灯录》、《释门正统》等；

2、顺序以僧人时代先后排列，年代不清者放后；

3、生卒年以陈垣《释氏疑年录》（简称《疑年录》，北京：中华书局 1964 年版）为准；籍贯指出生地，地名古今不同者括号注出。

唐代之前，除了一位籍贯不明的智晞，福建几乎找不到本籍高僧，闽外僧人寓居福建也大都缘于避乱和途经，并非以参学为目的，而且驻锡时间很短。比如梁代的宝唱和智文，皆因齐梁时期政治动荡而南下闽岭，在闽时间也都不是太久，宝唱于天监四年（505年）萧梁建立不久就回到建康，奉敕住于新安寺¹；真谛和阇那崛多都是印度来华高僧，据汤用彤先生整理的“真谛年历”来看，陈永定二年（558年），真谛与智文同止于晋安，“讲译都会，交映法门”，但天嘉二年（561年）到了梁安郡（泉州），隔年就泛海至广州²，总计两人在闽也就五年时间；再如隋时的阇那崛多，“因事尘染，流摈东越”³，由于卷入政治斗争而流放到了瓯闽。另外有一部分寓闽僧人是为了巡礼圣迹，但人数有限。闽东的霍童山在《华严经》中是天冠菩萨演说华严性海的道场，一直就有僧人隐居修行，如东晋的僧群迁居霍童山，“构立茅室”⁴，但霍童山佛教的兴盛还要到中唐之后，据《宋僧传》卷三十记载，高丽元表（表三-8）在西域受心王菩萨指示后，身携华严经寻访霍童，栖居于支提山石室⁵。僧群虽不知籍贯，大概也是江表人，得知有霍童山属正常，而元表在千里之外的西域就听说霍童，这说明其时霍童山已进入了全国佛教主流视野之中。

福建佛教史上本籍高僧要到唐代才开始出现，特别是中唐以后人数骤增。表二中怀道、怀一和智恒，也就是刘轲所言“闽中三大师”，在唐初就回闽弘传天台教义，是闽籍僧人的第一批。然而大规模的僧人回原籍还要等到唐代中后期，在很长一段时间，闽籍僧人游方参学后大都驻锡外地，不归闽中。如志贤、道通（表二-6、7）天宝初年师事马祖道一于家乡建阳，是最有可能留在原籍的，然而二人得法后都出外游方，最后落籍在太原和唐州。表二（6-16）共计十一位高僧弘法于闽外，时间集中于唐代中前期，这反应的是福建佛教信仰基础的薄弱。

¹ 《续高僧传》卷一《宝唱传》，《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426页。

²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章《北朝之佛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初版，第592-593页。

³ 《续高僧传》卷二《阇那崛多传》，《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434页。

⁴ 《高僧传》卷一二《僧群传》，《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404页。

⁵ 《宋高僧传》卷三〇《唐高丽国元表传》，《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895页。

僧人游方在求善知识的接引，即是否有参学中心可供寻师问道，如唐代中前期湘赣两地，其时福建显然不具备这种条件。福建佛教的发展属后起，如上文分析的，福建寺院局限于闽江流域，发展极不平衡，缺少群众基础，不利于摄受徒众。马祖道一（表三-6）在怀让处得法后就到了建阳的佛迹岭，天宝初年开始聚集徒众，志贤和道通为其时招收¹，道一不久即移锡江西临川²，其在闽行实也不过八年时间。假如道一留在闽中，那禅宗史恐怕就要改写了。临川即今抚州，与建阳之间隔着武夷山脉，道一入闽走的应该是杉关-光泽-麻沙一线，离闽入赣也是这条，这也是当时移民入闽的要道。唐代禅宗发展的重心位于长江中游，福建位置偏僻且交通闭塞，显然不适宜弘法根据地。大概，道一驻锡建阳一段时间后，发现此地不利于自家禅法的开展，之后才另辟道场。

安史乱后，禅宗开始一家独大，闽籍僧人也以习禅居多，如表二除（1-5, 16）等僧人外，其他俱为禅僧，且多属洪州（江西）禅系。从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福建佛教的迅速发展，大量闽籍僧人开始回乡传播禅法。据《三山志》记载，咸通八年（867年），福建观察使李景温邀请驻锡汾山的大安（表二-17）来怡山住持³，另据黄滔《雪峰义存碑铭》说义存咸通六年（865年）回芙蓉山（即怡山），其年圆寂大师（大安）也从汾山拥徒而至⁴，大安回闽约在咸通六或七年。大安先在慧藏门下得旨，后又参礼灵祐（表二-14），协助其师开辟汾山，灵祐卒后住持汾山法席十三年⁵。大安出外弘化六十载，暮年又回到故乡⁶，这固然与官府的支持分不开，但更主要的还在于中唐时期福建佛教已有利于摄受徒众，传播禅法。大安回归福建弘法只是众多僧徒回闽潮流中的一个缩影，而这种时代洪流直接导

¹ 《宋高僧传》卷九《唐太原甘泉寺志贤传》，《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763页；《宋高僧传》卷一〇《唐唐州紫玉山道通传》，第767页。

² 据王荣国先生研究，道一于天宝五至八年到了临川，载《马祖道一传法活动考论》，《宗教学研究》2006年第2期。

³ 淳熙《三山志》卷三四《寺观类二·西禅寺》，第390页。

⁴ 黄滔：《福州雪峰山故真觉大师碑铭》，《全唐文》卷八二六，第8703页。

⁵ 《宋高僧传》卷一二《唐福州怡山院大安传》，第780页；《景德传灯录》卷九《福州大安禅师》，《大正藏》第51册，第267页。

⁶ 大安元和十二年（817年）进具于闽北浦城，之后即前往洪州，在外时间约为六十年，详见宋传大安条。

致了福建佛教重镇地位的形成，其中为代表的是雪峰山僧团。雪峰义存是九世纪的大禅师，其门下出云门、法眼两宗，约与大安同时回到福建。咸通十一年（870年），义存（表二-20）于福州城西创建雪峰道场，经过五年经营，名动海内，“天下之释子不计华夏，趋之如赴召”¹。唐末五代时期，禅学重心逐渐从湘赣移入闽中，福建真正取得“东南法窟”的地位。当时僧人如万壑朝宗般到福建求法，如慧稜（表三-10）“闻南方有禅学，遂游闽岭谒雪峰……不下峰顶，计三十许载”²，又如桂琛（表三-12）“初谒云居，后诣雪峰、玄沙两会”，还有本净（表三-19）“响闽岭多禅宗知识，故历参之”³，这些僧人大都祖籍江表，参礼雪峰后就直接在闽中落单。当时的僧团规模也是惊人，雪峰山“冬夏不减一千五百”，玄沙师备拥徒七百多人，从慧稜得道者也“不减一千五百众”。在唐末以前，福建佛教一向以江浙佛教为依归，佛教经江浙而进入闽中，闽僧外出参学也以江浙为主，这使得福建佛教具有鲜明的江南特色⁴；但从唐代中期开始，这种格局逐渐被打破，福建成为了东南地区佛教重镇，如《宋僧传》玄沙条说：“至今浙之左右，山门盛传此宗，法嗣繁衍矣……江表学人无不乘风偃草欤”⁵，而且到宋代还在持续产生影响⁶。

总而言之，唐代是福建佛教的转折时期，此前很长时间，福建一直处于佛教边缘地带，本身发展缓慢而且极不平衡，集中于闽江流域的建州、福州等地，但从唐代开始，福建逐渐进入中国佛教发展的主流之中，在隋唐佛教宗派化进程中表现尤为突出，如“闽中三大师”是唐初天台宗中兴的前导，百丈怀海、黄檗希运是洪州宗形成的关键人物，但对福建佛教直接产生影响的还是回归闽中的怀道、怀一、智恒三大师，正是本籍僧人的回闽，福建才真正成为“东南法窟”，这恐

¹ 黄滔：《福州雪峰山故真觉大师碑铭》，《全唐文》卷八二六，第 8703 页。

² 《宋高僧传》卷一三《后唐福州长庆院慧稜传》，《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0 册，第 787 页。

³ 《宋高僧传》卷二一《唐福州保福寺本净传》，《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0 册，第 847 页。

⁴ 在中国禅宗形成过程中，这种特征表现得更为突出，印度禅演变为中国禅的实质是禅的玄学化，洪州宗福建一系在其中的作用尤为明显。

⁵ 《宋高僧传》卷一三《梁福州玄沙院师备传》，《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0 册，第 786 页。

⁶ 《宋高僧传》卷一二《唐福州雪峰广福院义存传》赞宁系语：“今江表多尚斯学，此学虚通，无系了达”，《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0 册，第 782 页。

怕就是“闽中佛法始于三大师”所暗含的历史意蕴了。刘轲虽为文士，然其历史识见确也绝人，在闽短短几年即敏锐观察到了福建佛教发展的历史巨变。

附记：本文曾提交北京大学第十届史学论坛（2014），感谢郭桂坤、张鹏、瞿林江诸君提出的宝贵意见。

[原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六卷（下）》，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2—36页。]